

敌意与和解

——对托尼·莫里森《天堂》中冲突的探析

董梅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作为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天堂》从1997年出版以来就获得评论家和学者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通过分析偏见导致冲突、敌意深化冲突以及和解化解冲突三个部分,对比鲁比镇与女修道院两个社区处理冲突的不同方式来强调和解在解决冲突中的重要性,从而凸显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只有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和解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消解冲突,才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

关键词:《天堂》;冲突;敌意;和解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5-0155-03

托尼·莫里森是一位极为多产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几乎获得了所有主要的文学奖项。《天堂》是她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小说通过对比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两个社区的不同命运来审视天堂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天堂》中冲突的探析,试图分析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两个社区之间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阐明在冲突中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冲突的重要性。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偏见导致冲突、敌意深化冲突以及和解化解冲突。

1 偏见导致冲突

鲁比镇的居民一心想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在鲁比镇居民的眼中,鲁比镇是一个安全、美丽且繁华的小镇。他们神化自己的历史,固守传统,一味排外。鲁比镇居民试图通过复制凋敝的黑文镇的模式来建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纯黑人社区,鲁比镇年长者思想僵化和刻板,其内部种族偏见泛滥。因此,在鲁比镇井然有序的假象下,鲁比镇并不安宁,恰恰相反,鲁比镇内部因偏见而充满了各种冲突。

1.1 僵化刻板导致冲突

僵化(Rigidity)与刻板(Stereotype)是偏见的两种表现形式。心理学家贝斯黑莱姆在《偏见心理学》一书中提到,“僵化意味着在解决一问题或任务时,相对来说,不能从一种思想方式或者假设转移为另一种思想方式或假设。”而“刻板”在《简明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为“没有变化地继续进行或不断重复某事。”^[1]鲁比镇的年长者思想

刻板僵化,固守祖先的传统,对新思想与新观念抱持偏见。这种对待新事物僵化刻板的态度最终导致鲁比镇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冲突的发生。

鲁比镇家长制的传统使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冲突不断。年长者神化他们祖先开创家园的英勇事迹,固守祖先们的传统不求改变。年长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祖先的事迹,他们“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承受、智慧、技巧和力量的证明”^[2]。而鲁比镇的年轻人对年长者家长制的作风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思想不屑一顾。在鲁比镇各种冲突中,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围绕作为鲁比镇先辈艰辛开创家园象征的大炉灶而展开的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冲突。鲁比镇上的年长者对挑战他们权威和他们立下的规范的年轻人极为愤慨。当鲁比镇居民召开集会澄清大炉灶上的铭文时,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围绕着大炉灶上铭文的争议,到底是“当心他皱起眉毛”还是“是他皱起眉毛”^[2]。关于大炉灶上铭文的争议“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与改革两种观念的分歧。”^[2]在小说的最后,鲁比镇的男人袭击女修道院之后,曾经作为社区团结象征的大炉灶,倾倒到一侧,年轻人将大炉灶上的铭文改为“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2]。大炉灶上铭文的改变表明年轻人对年长者家长制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反抗。

1.2 种族偏见导致冲突

根据贝斯黑莱姆,“种族偏见(Ethnocentrism)就是一种美化自己种族团体而贬低其它种族团体的倾向;通常包含一种不言而喻的意见,认为自己种族团体是处在一

系列同心圆的中心。”^[1]鲁比镇的居民认定浅肤色黑人血统受到“污染”而歧视孤立他们,这种种族偏见最终导致“八层石头”(肤色纯黑的黑人)和浅肤色黑人之间的冲突。

鲁比镇的先辈们曾在自己种族领域内遭到排斥,在鲁比镇年长者眼里,这不仅将鲁比镇先辈驱赶出他们的住所,而且羞辱了他们的种族。被自己种族的人拒绝的辛酸给鲁比镇的居民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也成为鲁比镇将自身与外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的源头。一味追求种族血统的纯正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并且引发了“八层石头”和浅肤色黑人之间的冲突。罗杰·贝斯特由于娶了浅肤色黑人女子为妻而在鲁比镇备受歧视,连他们浅肤色的女儿帕特以及外孙女比莉·狄利亚都在鲁比镇抬不起头。贝斯特一家正是这种种族偏见的受害者。比莉·狄利亚因3岁时“当街脱掉短裤”^[2]而受到鲁比镇“八层石头”的鄙视。

2 敌意深化冲突

鲁比镇是一个有着深厚且复杂历史的小镇。鲁比镇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奴隶制时期,其先辈多次受到种族偏见与歧视的困扰。女修道院是一处聚集着一群逃离她们破碎生活的受伤女人的避难所。两个社区之间的矛盾是整部小说的主线。当鲁比镇因隔绝自身、顽固守旧而日渐衰败时,鲁比镇居民认定是女修道院罪恶的女人们败坏了风气,并将他们的灾祸嫁祸于这些无辜的女人们身上。他们对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充满敌意,这种敌意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替罪羊。

2.1 冲突中的杀人犯

根据心理学中的驱力理论,外在环境(比如挫折感,令人不悦的环境条件)会引发伤害他人的动机,因而产生了侵害他人的行为。193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N. E. 米勒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提出了“挫折——侵犯假说”(Frustration - aggression hypothesis),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3]当鲁比镇的男人们无力阻止鲁比镇的衰落,无力解决自身内部的各种问题时,他们将灾祸归罪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

鲁比镇的男人们憎恶女修道院女人们奇异的着装并鄙视她们轻佻的行为。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在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上都挂着装饰物;她们在凯迪拉克后座上互相亲吻;她们中的有人在公共场所互相打斗。”^[4]在鲁比镇男人们眼中,所有这些行为在鲁比镇都是不被容忍且从未有过的。他们将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描述为“妓女”和肮脏的“烂泥”^[2]。他们像“粪堆上的苍蝇”一样腐坏鲁比镇的居民。在鲁比镇的男人们看来,除了给鲁比镇带来坏影响之外,这些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威胁了他们的男权,因为她们不需要男人。根据“挫折——侵犯假说”,受挫者往往寻求比自己弱小的人作为“替罪

羊”,向其发泄挫折感。鲁比镇的男人们面对挫败,将镇上的灾祸和麻烦全都归罪于这些女人:他们认定这些女人藏起了婴儿,因为阿涅特生的孩子消失不见了,而斯维蒂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但未曾有人见到婴儿。她们不合常规的行为败坏了鲁比镇的年轻人。比莉·狄利亚自从在女修道院瞎混以来,就将她母亲推倒在楼梯上。他们甚至将一个鲁比家庭中同时出现四个生病的孩子归罪于这些女人。正是基于这些毫无逻辑的理由,鲁比镇的男人们将自身的挫折感发泄到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身上,在一个黎明突袭并杀害她们。因此,鲁比镇的男人们无一例外地将自身的不幸归罪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了冲突中的杀人犯。

2.2 冲突中的替罪羊

《圣经》中替罪羊的隐喻与独裁人格理论(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紧密相连。独裁人格理论由Aalonen等人提出,指怀有偏见的人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别人,那些受责难的人“就承担了那些怀有偏见的人的罪过,因而成了他们的替罪羊,而怀有偏见的人有意驱赶他们。”^[1]鲁比镇的男人们将他们镇上一切灾祸都归罪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指责她们败坏了风气。当这种怒气无处释放时,他们找到了自身罪责的替罪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

面对鲁比镇内部的灾祸及其日渐衰败的迹象,鲁比镇的男人们不是通过审视自身来寻找原因,反而对这些无辜的女人们怀有偏见和敌意,将一切问题愚昧地归咎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身上。当灾祸降临于鲁比镇而鲁比镇的男人们失去控制时,这种敌意与愤怒最终以杀害女修道院女人的方式得以释放。“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构成证据……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一件事就是在女修道院中。”^[2]每个参与杀害的鲁比镇男人都在寻找一个他们个人或家庭烦恼的替罪羊。比如,威士顿·普尔在他两个儿子为比莉·狄利亚互相杀害对方后对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怀恨在心;阿诺尔德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将他们四个孩子的生病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巫术;斯图亚特将第肯和康妮的风流韵事视为一种家族荣耀的威胁。鲁比镇男人们遭受的挫折最终导致他们残酷杀害这些无辜的女人们。当他们无力阻止鲁比镇的衰落,无力解决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无能和软弱最终导致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他们自身罪行的替罪羊。

3 和解化解冲突

与鲁比镇不同,女修道院是一座“开放的房子”,聚集了不同种族和身份的女人。女修道院为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自从女修道院接收第一位受伤的女人玛维斯后,女修道院从此演变为一座受了身体或精神伤害以及那些没有住所的漂泊流浪女人的庇护所。这些女人陆续加入这座女修道院,她们有着不同的个性,却有着因男人的冷漠无情而饱受伤害的类似经历。虽然她们经受自我内心冲突以及个人之间冲突,但这些冲突最终通过和解的方式得以化解。

3.1 自我内心冲突的和解

玛维斯生活在一个父权制传统的社区,“超我”要求玛维斯牺牲自我,忍受压抑与恐惧服从丈夫,遵循社区内部父权制的“道德原则”,而“自我”要求玛维斯面对自己遭受奴役的客观现实,分析现实的条件和自我的处境,以找回内心的安宁。因此,她内心渴望挣脱父权制的束缚,摆脱现实的处境,找到自我。弗洛伊德认为,防卫是正常人格的一部分,当焦虑发生时,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人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加以防卫^[5]。玛维斯是一个遭受丈夫和社区冷漠对待的女人。玛维斯的一对双胞胎意外死亡之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玛维斯的丈夫弗兰克视她为一件个人财产,并且阻止她与其他女人结交为朋友。玛维斯本想更多地了解佩格,“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2]他甚至称她是“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2]更为糟糕的是,她的邻居们对玛维斯的艰难处境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态度异常冷漠。这种冷漠可以在小说第二章的开头明显地体现出来:“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2]玛维斯渴望挣脱丈夫的奴役,却因为恐惧而忍受着丈夫的奴役而未做出任何行动。当玛维斯遭受丈夫的蔑视和邻居的冷漠对待,意外“杀”死她的双胞胎,害怕丈夫怪罪而内心焦虑不安时,她的内心冲突开始凸显:是继续做一个受奴役的家庭主妇还是逃离水生火热的生活,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女人。最终,她通过“撤退”(逃离她充满压抑与恐惧的家来到女修道院)而非“压抑”(继续作为一个饱受奴役的妻子)的方式来自我防卫。她最终选择逃离她饱受奴役的家,将自身困境与内心渴求达成和解,这些冲突才得以消解。

3.2 个人之间冲突的和解

尽管女修道院是一个聚集着一群受伤女人的庇护所,但其内部并非毫无冲突。事实上,她们都曾饱受恐惧与压抑的折磨,并且都有一段辛酸的过往。她们的生活几近一团糟,女人们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和冲突。然而,她们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经受了精神洗礼,最终学会了互相关爱和理解,用和解的方式消解了冲突。

在这部小说中,玛维斯和吉姬之间的冲突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于玛维斯来说,作为一个“逃犯”,虽然她受到了女修道院的庇护,而且她似乎也把她修道院当成了真正的家;但玛维斯对自己作为抛家弃子的“逃犯”身份仍是一块她不愿揭露的伤疤。而吉姬经历了家庭的破裂——父亲的终身监禁、父母的离异以及母亲的再嫁;并且,她曾亲眼见证白人当局对黑人的压制和迫害——一名黑人小男孩成为他们迫害下的受害者。这些创伤记忆根植在她脑海,对她无拘无束、胆大放肆个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吉姬表面上是一个鲁莽轻佻的女人,但实际上她内心极其脆弱无助。因此,对于吉姬来说,这种冲突与打斗似乎是发泄过往伤痛的出口,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吉姬触及到玛维斯的伤疤时,一场不可遏制的冲突便由此引发。

然而,尽管女修道院的女人们之间有言语甚至肢体冲突,但她们最终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告别了她们过去的伤痛记忆和争吵不断的生活。通过回顾自身痛苦的过往,康瑟蕾塔认识到与自身及他人和解的重要性。康瑟蕾塔让这些女人们以“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的“喧嚣的梦”的形式讲述她们不敢言说的过往^[2]。尽管她们承受着痛楚,每个女人“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2]“‘喧嚣的梦’使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懂得了相互理解和关爱。她们开始互相扶持以面对过往伤痛的经历。”^[6]这些女人们在身体和精神、过去与现在以及自爱与他爱之间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不仅使她们从过往的伤痛中解脱出来,而且消解了她们之间的冲突。

4 结语

本文对比了鲁比镇与女修道院两个社区对待冲突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以此说明和解在消解冲突时的重要性。对于有着家长制传统的鲁比镇,从内部方面看,因鲁比镇年轻者的历史偏见,年长者与年轻人发生激烈冲突,又因鲁比镇居民的种族偏见而导致“八层石头”与浅肤色黑人之间冲突不断。从外部方面看,鲁比镇因无力控制小镇日益衰败的局面,将镇上一切灾祸归罪于女修道院无辜的女人们身上,对这些女人的敌意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她们成为鲁比镇男人们自身罪行的替罪羊。然而,女修道院却是一个不分肤色与身份、接收任何受伤女人的避难所。玛维斯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了自我内心之间的冲突。女修道院女人们之间的冲突最终也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以和解的方式得以消解。从而凸显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只有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和解和开放的心态来消解冲突,才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

参考文献:

- [1] (英)道格拉斯·W·贝斯黑莱姆. 偏见心理学[M]. 邹海燕, 郑佳明,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2] (英)托尼·莫里森. 天堂[M]. 胡允桓,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3] Miller N E, Dollard John.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39.
- [4] 佟晓牧. 替罪羊——浅析莫里森小说《天堂》修道院中的女性人物[J]. 思想战线, 2011(S2): 276-277.
- [5] (奥)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 [6] 梁艳. 对托尼·莫里森《乐园》的主题探析[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04.